

康熙 雍正 乾隆

盛世中的君臣关系

邹范平 / 著

知道一点常识
辨明一点真相
懂得一点道理
再去读史
再去理解君臣关系就不是看热闹了

康雍乾

盛世中的君臣关系

邹范平/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雍乾盛世中的君臣关系 / 邹范平著. --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24-11171-2

I. ①康… II. ①邹… III. ①皇帝-关系-大臣-中国-清代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7583 号

康雍乾盛世中的君臣关系

邹范平 著

出品人: 惠西平

总策划: 宋亚萍

策划编辑: 李向晨

责任编辑: 周远 李向晨

装帧设计: 高洪亮 姚立华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1.5

字数: 337 千字

版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4-11171-2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 bwcq@163.com

发货电话 010-88203378

前言

君臣之道有三，虚君论、尊君论、无君论。儒家为虚君，法家是尊君，国家政治有虚实之分，儒家是虚，法家为实，君臣矛盾中有儒法之争。无君论是根本否定王权，讥虚君论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凡群居动物，都有一个王权的问题。如被富强之人奉为“图腾”之狼，即是等级王权最突出的动物；人类的祖先猴子也常为王权而打斗；愉悦之鸟鸣，常常在争话语权。邹容说，人类社会之初，无所谓君也，无所谓臣也。尧舜禹稷，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后世之人，不知此意，大盗巨寇，自尊曰君，曰皇帝。^①上古社会是虚君政治，民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① 邹容《革命军》。

五帝时期，君权不碍民权。三代（夏商周）以后，君权逐步压制民权，“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主专权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①乃至于今人已不大知道，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是开放的，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对待的同事关系。孔子说：“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春秋时代，忠是诚信的意思。孔子说：“为朋友谋而不忠乎？”臣对君之忠，与待友之忠并无差别。鲁穆公问孔子之孙子思：“何为忠臣？”子思答：“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这里臣对君的忠表现为谏诤。唐代的魏征是最敢谏诤的，因此最有资格称忠臣，然而他却只要做良臣，而非忠臣，因为忠臣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君主也会因此而落个骂名。可见，“忠”的含义已经变化，变成了在下者对在上者的诚信态度，忠言就不再逆耳，而是悦耳了。清人钱大昕说：“后人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殉国者为忠，而忠的含义就狭隘了。”这种狭隘的君臣意识渗透在中国上下级人际关系中。有人都把它归罪于孔子，从而痛恨中国文化。这是孔子思想被后人歪曲，现代批评者又不去做探本溯源的工作，只站在历史虚无的立场上否定王权的缘故。须知，王权一事，有抑制与扩充之不同，儒家要抑制，法家要扩充，同时又纠缠不清。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以及之后的战国时期，君臣关系是一种松散形式的结合。臣对于君来说，只是客卿，不投缘便走人。俗话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无所谓体制内外。惟其如此，客卿的能量十分巨大，身价甚高。在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的逼迫下，各国君主莫不求贤若渴。燕昭王特筑黄金台求贤臣，郭隗先生以四类君臣关系供他选择：“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在前两种情况下，君臣是合作的关系，是儒家所提倡的。在中国历史上，四种君臣关系或并存或单存，随国家气运变化而变化。本书将从这四个角度分析康雍乾时期的君臣关系。

第一，“帝者与师处”。帝，圣人之君。五帝三代时期的大臣都是非常受尊重的。有文字可考的商代，大臣伊尹可放黜君主太甲；伊陟可对君主太戊“弗臣”，贤臣可制约君主。周初，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是最典型的虚君政治，臣重而君轻。这种君臣关系是原始儒家最理想的政治体制。顺治朝前期为摄政体制，多尔衮的摄政，

^① 1903年《国民日报》，《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

形式上类似于周公摄政，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康熙初年，大臣辅政，鳌拜飞扬跋扈，小皇帝拱手而坐。“满洲家法”——摄政、辅政王大臣，乃至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分配形式只表现出了消极的一面。康熙夺回权力以后，摒弃“满洲家法”，实行“清承明制”，大权一揽。所谓“明制”，本质上是“秦制”，然儒家政治辅助之功亦不可没。

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就是虚君摄（辅）政，“屈君以申臣”，这与“满洲家法”倒是如出一辙。孔子极端推崇周公模式，他在理想破灭之际说：“吾不复梦见周公矣。”孔子生前理想即已落空，死后却又大昌，延续两千年之久。这似乎很矛盾。真实情况正如朱熹所说，孔子之道，从未实行。所以把孔子以后的君主专制都归罪于儒家是不合逻辑的。原始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宰相辅政，君主拱手而治，这是儒家的无为而治。道家的无为而治则更加广泛，法家也有无为而治，内涵都不相同。

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君臣关系和君（官）民关系。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是要君臣各尽其责，并没有“君为臣纲”的意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所谓“三纲”，虽然是汉代董仲舒与《白虎通义》明确提出，但却是引进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知识产权”，将法家思想融入儒家的结果。古代学术界把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家，其实，董仲舒已经不是旧儒家了。旧儒家是不赞成人臣以奴才的身份受“役”于君的，他们与帝王是师、友、臣的关系，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是如此。尤其是孟子，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关系，而不是如法家所言的绝对服从关系。虽未曾实行，但是他的思想却有永恒的价值。今日总统与部长的关系就是如此。

大凡创业的君主，身边都有一两位出谋划策的“军师”。守成的皇帝，则从小就从帝师学习文化道德，一直到成年以后，都在接受帝师的教育。康熙的身边聚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帝师。有些人起初并没有在内阁任职，后来却成为朝廷重臣。康熙为人宽厚，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

第二，“王者与友处”。王，夏商周的国君称王，此处是指行王道者。春秋时代，有的君臣是朋友关系，如齐桓公与管仲；晋文公与赵衰、狐偃。行王道的君主却没有。康雍乾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君臣关系中都有朋友的内涵，只是并不纯粹，也不能长久，不能贯彻始终。比如，康熙与索额图的关系，在康熙尚未真正亲政，即

没有把实权从鳌拜手中夺过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中有朋友关系的成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微妙的关系，后来索额图才敢为非作歹，而康熙所以对他容忍再三，也是因为在康熙的思想中还保留了一丝朋友之间的温情。雍正则不然，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在夺得皇位之初，他与年羹尧的关系中也有朋友温情的成分，甚至表现得太过分了。也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后来年羹尧就犯下了“胸怀不轨，几欲叛逆”之罪。雍正一旦处在最高位置上，就很难容忍君臣关系中有朋友关系的成分。乾隆也是如此，他的《怀旧诗》曰：“业师只三人……云师而实友。”乾隆与大臣之间的师友情分只能是未登基前。他们与康熙在君臣关系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

第三，“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霸，法家君主。春秋五霸也不都是如此，齐桓公尊管仲为师父，称为“仲父”。“霸者与臣处”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君臣完全以利害相结合，关系就很冷漠了，失去了人情味，一般的君臣关系都是如此。这是法家提倡的君臣关系。仅就工作关系说，现代政体也是如此。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往往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主要都是“亡国与役处”之主奴君臣关系。当然，国并不都亡。但如果是按照顾炎武的意思，虽不亡国，也是亡天下。那么，“亡国与役处”就很恰当了。

雍正曾手书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悬挂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这话源于唐太宗《大宝箴》。赵匡胤也很赞同这句话。明末思想家朱舜水则修改为“以一人劳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原始儒家也是这个意思。《吕氏春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正如“君君臣臣”并不等于君为臣纲一样，这副对联也可以做正面的解释。问题不出在“一人”的称谓上，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本质上总有主奴的内涵，并非改了称谓就能解决问题。“君君臣臣”可以改称为“总统部长”，主奴关系依然如故，或者更甚。人类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进步都不可能否认国家要有“一人”做元首，即使是今日之总统与部长的关系也不能没有“一人”为首，只是古今形式不同，现代政体中的总统这个“一人”要受制于其他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时，诸事也要与群臣商议。区别在于总统是选出来的，皇权是夺取的，故总统不能独断乾纲，而皇帝可以一言九鼎。

康乾盛世“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是比较充分的，既没有宦官外戚的欺君篡

政，也没有大权旁落于权臣之手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君主专制形态，乃有所谓盛世。那么其他时期为何不出盛世呢？大概是没有充分的“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而是过多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的缘故吧。

第四，“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这是秦皇模式，秦始皇是法家治国的最大成功者，其成功主要表现为统一天下，治理天下却是失败者。秦是一个非常短命的帝国，只有十四年国运。秦之辉煌与其速亡，是一体两面。不应只见其成功，不见其失败。秦的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都是“亡国与役处”的关系。君主役使臣子如奴才，君臣之间是主奴关系，人臣只是皇帝的工具。“役”即是以奴才的身份受驱使，与“臣”是有区别的。不过，“臣”与“奴”的定义往往是混淆的。在清朝，满臣都自称“奴才”，尤其可笑的是，这竟是满臣的特权，汉人只能自称“臣”。如此一来，“臣”与“奴才”画了等号就是殊荣，是自家人。不能称“奴才”的汉臣，成了外人，低于奴才一等，这正是“君主专权达于完全极点”的表现。

康熙时期的君臣关系“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重于“亡国与役处”；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亡国与役处”等于“霸者与臣处”；乾隆时期“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重于其他形式的君臣关系。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清代的衰亡始于乾隆后期。康熙对待人臣比较有人情味，近臣犯了法，康熙对他们的惩治都比较轻，这就使得一些贪官无所顾忌。雍正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采取严厉手段整治贪官，内外官员都感觉透不过气来。乾隆又来纠偏，最后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意压抑清官，而纵容贪官，盛世就完结了。

两千多年来，君臣关系时好时坏，发展方向是趋于恶化，从下面这些事情上也可看出君臣关系发生了负面的变化。在周公孔子时代，君臣可以相对而坐，“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之际，甚至可以坐得很近，促膝谈心也是常事。在秦汉时期，君臣也是如此。有诗为证：“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描写汉文帝向贾谊请问治国之策的情形。一直到唐朝，朝堂上都是，君坐，臣也坐。从宋朝开始就改革了，赵匡胤改革为君坐，臣站。元朝又改革，改为君坐，臣跪，一直延续到明清。“亡国与役处”成为理所当然。乾隆朝以后奴化程度就更深了，连官僚之间下级遇到上级的作揖之礼，都被改革为半跪之礼或下跪叩头。年羹尧在忘乎所以的时候，竟敢在雍正面前“箕坐无人臣礼”，日后，这就成了他的罪状

之一。

秦之后，儒家君臣之道最完善的时期是在汉初。相权崇高，所谓“屈君以申臣”，如丞相进殿，皇帝要站起来迎接，皇帝路遇丞相，要下车，等丞相走过以后再上车。遇国家大事，皇帝一定要去朝廷与丞相商议而定。丞相对皇帝的命令可以拒绝。唐代，三省分权与政事堂制度对皇权的约束作用也很大。这些都是儒家君臣之道的表现。

任何事物都是“一阴一阳”，有坏必有好，没有单纯之物。历史事实是，儒家政治逐步为法家政治所改造。西方人分不清儒法的区别，笼统称为中国文化，只见中西区别，不懂儒法不同。许多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或国人“国民性”的书也都是如此，以西方为本，中国为末。儒法不分，戏说历史，就像是乘坐时空穿梭机，上下几千年，忽来忽去。

古人有“君不君，则臣不臣”的说法。“不臣”又如何呢？以“汤武革命”的形式替天行道是儒家提倡的，叫做“宪章文武”。但是“君不君，则臣不臣”更普遍的表现形式却是法家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昏君与贪官的关系尤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与役处”是常态，然而也并不都会亡国，如果没有严重的外部威胁或内乱，亡国就只是一种潜在的趋势，一种隐患而已。如果按照顾炎武的“亡天下”概念的定义来衡量中国社会的“亡”，则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即使没有“亡国”，也是处在“亡天下”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是“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使然。但也并不存在单纯的“亡国与役处”的关系。在“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这几种君臣关系中，主奴君臣关系造成的亡国趋势，在康乾盛世被其他三种君臣关系形成的力量抵消了，并不能直接导致亡国。一直延续到道光帝后期，外强入侵，亡国问题才凸显出来。

一般来说，在君臣关系中，前三种君臣关系的成分都很不足，而第四种君臣关系的成分则太充分。原始儒家的臣道没有实际限制君权之力，孟子以德抗爵（权），或以威贵之卿易昏君之位的主张很难实行。儒家的臣道即使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也会因帝王的压制而被人们所忽视。人们所知者，乃法家臣道观念，今被民权观念所否定，儒家观念也为之陪绑。

孟子认为，为臣者有“责难于君”与“格君心之非”的责任。他说：“责难于君主称之为恭，向君主陈述善言防避邪念称之为敬。以为君主不能为善的人臣，就称

之为贼臣。”“一正君主，而国定矣”。虽然在臣道方面加强对君主的道义责难实属不易，但只要不是奸臣，做臣子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尽了此一职责。关键在于帝王能否接受或容忍。清官与皇帝的主奴关系，只是形式上的，本质上则不是。康熙朝，颇有“君臣有义”的气象。

在君臣之间的关系中，君无疑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君贵臣贱如父尊子卑，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有其君亦必有其臣。不过，在一段时间内，君臣的明暗程度并不是对等的，要有一段磨合期。或是奸臣最终受到整肃，如明珠；或是奸臣渐渐得势，如和珅。

为臣之道，古人有所谓“难进而易退”的说法。因为如果完全按照儒家为臣的原则去行事，真正的清官就很难做到一、二品大僚，更不要说得到宰相的高位。而纵观康乾盛世一百多年，一、二品大员，或首辅为清官者，是不少见的。因此，康雍乾三帝及其朝政，相对于历史上其他时代，是较为清明的。

关于君臣之道，清人陶贞一说：世上确实存在大有作为的君主，侧席^①求贤，岂不愿意得到能人而用之？可终不能得到，为何？积习使然。汉朝的汲黯奉使往河内，不至而返，又擅自开仓赈济流民；唐代魏征，进谏不纳，太宗再与他讲话，他就不回应；裴谔奏事，皇上问他榷酤（国家垄断卖酒）之利，他很久也不回答（因为皇帝问的是发财的问题）。他违抗君主的命令和朝廷制度，十分专断。像魏征和裴谔这样的行为，就是大不敬，若是在唐朝以后的时代，岂能一日容于朝廷之上呢？因为明主有特别通达的见识，不在细节上苛责大臣，以激扬他们的意气，如此一来，磊落奇伟之才就可出现，骨鲠之臣就能进用。这种人只要得到几位，天下也就可治理了。^②

那么，康乾盛世的出现，是否就是皇帝容忍大臣的结果呢？至少在康熙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但是形式却大不相同了。因为君臣关系形同于主仆，所以，像魏征和裴谔这样“从道不从君”的政治恐龙早就在朝廷上绝迹了。在雍正时代，就更不能容忍臣子有违抗旨意的行为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尊重大臣的意见。到了乾隆时代，尤其是乾隆后期，由于主仆关系的恶化，差不多到了孟子所说的“君视臣

① 虚左以待之意，《后汉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② 《为君难，为臣不易论》。

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地步了。但是容纳直言的行为仍然有，因为有制度作保障。

一般来说，才干与道德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谨慎敬业的大臣，必有真政绩，虽然也可能因此得到皇帝的赏识，但是也可能因此而受到皇帝的猜忌，稍有错误，就可能受到整肃。自古以来，君臣之道，缺乏的不是才干，而是道德。康熙虽然没有唐太宗的雅量，至少也是宽宏大量的。在注重道德这一点上，康熙甚至胜过唐太宗，雍正也是如此，所以清朝前期就很强盛。乾隆的道德就明显地不行，虽然清官也能被重视，但和珅却得到他终身的保护。这固然与和珅的机智有关，然而乾隆的道德有亏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官员之间怎样斗争？无非是利用制度。制度无论好坏，都可以被不同的人所利用。对于古代的监察制度，本书略加介绍，因为这是读史不可不备的常识。还有一些常识更是不可不知道的，那就是古人有关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以及君臣关系的观念。人们似乎很缺乏这方面的常识，某些作者往往以想当然的态度信笔戏说，许多人也只能看得懂戏说的东西。俗话说，读史是“为古人担忧”，今则不然，专门学习古人的阴谋诡计，然而却学不到手，反被聪明误。某些古人把读史称为“玩物丧志”（如程颢之批评谢上蔡）。朱熹虽然并不反对读史，但也不主张没有观点和常识地读史。他说：“史亦不可不看”，“凡观史书，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常人“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①陈亮（字同甫）是否因读史学坏了姑且不论，至少今人确有不少人因读史而学坏了。常识不知，真相不明，道理更不懂，就坏得一塌糊涂。因此，要从读史中得到益处，首先要懂得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再去理解君臣关系的史实就不是看热闹了。

个人虽然是制度和命运的工具，但同时也是制度和命运的制造者。个人既被他人制约和塑造，也塑造和制约他人。清朝皇帝和官僚们赖以产生影响力的君臣关系与人事关系有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比个人意志强大得多。任何人，不论多么位高权重，机智聪明，只要处在这个实体当中，就要服从于这个他进退沉浮都不离其中的人际关系法则。因此，个人的行为和命运就脱离不开某种先行规定的进程。但是，

^① 《朱子语类》卷十一。

个人的活动空间总是存在的，无论为君或为臣的成败，都是既受制于制度，也取决于个体。这是本书的兴趣中心。在描述历史时，个人的行为是否能解释历史进程，也是一个问题。个人的得失自己也很难完全把握，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都是如此。

上篇 / 帝王与师友处——康熙帝的宽仁

002 放弃满洲家法，确立君权一揽

003 虚君摄政是儒家之本旨

010 鳌拜辅政成为乱政

014 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

017 第一帝师熊赐履

025 南书房师友

037 以汉治汉，乃异种称王之道

038 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

046 非郑氏叛将不能收复台湾

053 君臣以义合

055 于成龙以道事君

060 康熙对汤斌态度的转变

066 保护清官张伯行

070 君臣治河与朋党之争

084 康熙的法家治术

093 整肃帝师

107 索额图由第一功臣变为第一罪人

112 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

中篇 / 霸者与臣处——雍正帝的苛察

- 126 即位之谋**
 - 127 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
 - 130 以儿子的才华，博取父皇的欢心
 - 133 夺位成功
 - 136 确立秘密建储制度

- 141 恶犬不可不烹**
 - 142 年羹尧之自裁
 - 152 隆科多之圈禁

- 157 澄清吏治，重用能臣**
 - 158 模范疆吏田文镜
 - 164 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
 - 170 追查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
 - 175 诺敏、高成龄首倡养廉银制度
 - 183 岳钟琪弹劾贪官污吏
 - 189 宠臣李卫
 - 193 以密折制度威慑地方大员
 - 202 给事中并入御史台
 - 207 鄂尔泰于难以措手之地显才干
 - 214 张廷玉制定军机处章程

220 神道设教以整治贪官

231 不臣之民与文字狱

233 汪景祺与钱名世之狱

235 查嗣庭之狱

237 陆生楠之狱

241 谢济世之狱

243 曾静、吕留良之狱

下篇 / 亡国与奴处——乾隆帝的专横

248 初政尚宽

248 为何篡改即位时间和地点

250 物极必反，殊途同归

255 鄂尔泰、张廷玉的命运

260 好大喜功，遥控军机

260 傅恒、岳钟琪初定大小金川

268	阿桂再次平定金川
270	既重贤臣，也宠奸相
270	刘统勋、刘墉父子皆贤
276	于敏中的忠心与“小聪明”
282	和珅是乾隆的知己
304	文化与文字狱
304	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312	胡中藻之文字狱
317	乾隆的霸道
325	结 语

上篇

帝者与师处——康熙帝的宽仁

